



新中国会计工作的开拓者

· 专访 ·

——记杨纪琬教授

丁平准

《财务与会计》辟“专访”专栏，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财会人员，介绍我国著名会计专家学者，以此为后来人树立楷模，激励财会战线人才的成长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当编辑部约我写一篇杨纪琬教授的专访时，也就欣然从命了。因为，近六年来，我在财政部一直是在杨纪琬教授直接领导下工作，应该说对杨教授的治学精神、学术观点、工作贡献是比较了解的，写一篇几千字的专访，估计问题不大。

经过几番思索，以“新中国会计工作的开拓者”为题，我开始构思文章。我想，年过古稀的杨纪琬教授，从1935年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会计系以来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，将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会计事业。特别是建国以来，新中国会计事业的发展，紧密联系着杨纪琬的名字。在共和国四十个春秋中，杨纪琬司长堪称新中国会计制度的奠基人之一；在发展社会主义会计理论研究中，杨纪琬教授堪称成果丰硕的拓荒者；在培育人才的会计教育战线上，杨纪琬老

师堪称辛勤耕耘的园丁。他从参与组织领导了新中国会计制度建设的全过程，从五十年代第一份全国工业企业统一会计制度，到八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《会计法》，无不凝聚着杨纪琬教授的心血；我国近十年注册会计师事业的蓬勃发展，离不开杨纪琬司长的倡导和精心组织；社会主义中国会计界走向世界，发展与各国以及国际会计组织的交往，杨纪琬教授是探索、开拓、铺架友谊桥梁的先导；他参与创建并主编了解放后我国第一家会计杂志《新会计》；他率先发起成立全国会计学术团体中国会计学会，并在十年里主持了学会的日常工作；他是“会计双重属性”、“会计管理活动”、“社会主义会计制度建设理论体系”、“两权分离条件下会计改革的基本模式”、“五种成本核算方式”等等对发展中国会计理论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学术观点的提出者；在共和国会计事业的每一个领域里，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至今，杨纪琬教授虽年过七十，但仍然兼有十多个并非荣誉称号、而是实实在在需要付出精力的工作职务。诸如：全国政协常委，中国会计学会常务副会长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长，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，联合国国际会计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成员，《会计研究》、《会计学丛》主编，财政科学研究所会计学博士、硕士研究生导师，以及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央财金学院、天津财经学院、东北财经大学、西南财经大学等十多所高等院校兼职教授。辛勤耕耘五十个春秋，至今仍老骥伏枥，壮心不已。所以，我想，“新中国会计工作的开拓者”对于杨纪琬教授来说，不是过誉之称颂，而是求实的写照。

我写好了提纲，收集了资料，等待杨纪琬教授给我一个“专访”的时间。年前曾应允谈一次，但被繁忙的外事活动挤掉了，他远离京都，飞越印度洋，去非洲进行友好访问。后安排在1988年底谈一次，又被紧张的学术活动挤掉了，为了安排、筹备、组织会计原则专题理论讨论会，他连元旦都是上海度过的。直到旧历龙年的除夕之日，大家都在收拾公文、打扫卫生、准备过年了，杨教授才在会计学会的资料室里，接待了我的“专访”。

当我说了我的想法以后，杨纪琬教授却认为“开拓者”对他是“过誉”之称，他说他自己也是“后来人”，真正的“开拓者”应该是财政部会计制度司第一任司长、我的老师安绍芸。他说：“五十多年前，我在大学念会计，一些主要专业课都是安教授亲授，到四年级，我一边读书，一边当他的助教，还在他的会计统计事务所当审计员。毕业后，1942年我当了教授，在上海

五所大学教会计，其中三所大学会计系就是他的系主任。建国始初，我们一起来到财政部，安教授就是会计制度司司长，我开始是副处长，1956年任副司长，一直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。遗憾的是他在1957年全身瘫痪，过早地离开了中国的会计事业，那时他才57岁，至今仍深深地怀念他。我大学毕业走上会计战线，影响我毕生事业的有两个关键：一是教书，因为要教书，所以在理论上要不断充实自己；一是从事审计工作，能够广泛地接触社会、接触基层、接触实际，取得了比较广阔的实践经验。而这两条，都是安教授把我引上路的。我想这两条，对今天财会战线的年轻人，应该是能够有所借鉴的。”

杨老满怀深情的话语，在我心中激起了感情的涟漪。我说，安老是您的老师，您是我们的老师。我们四五十岁的这一代人，从开始走上会计工作岗位，就对您十分敬慕，翻开各种据以办事的制度、公文，我们的眼前都时刻浮现出您那亲切的形象，我们深深感到这三十多年走过的路程，都有着您开拓的汗水。

窗外已传来阵阵鞭炮声。杨教授不无感慨地说道：“除夕一过，对我们老年人来说，是又老了一岁。我已年过古稀，该是‘告老’之年了。现在我还担任了一部分工作，职务的称谓也很多，但我最喜欢的还是‘老兵’这个称谓。在会计这一行干了五十多年，多少有点经验，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，写出来，对青年人多少会有些参考价值的。”接着他讲了三句话，建议作为这篇专访的中心内容，介绍给读者。

杨老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困”。这是《礼记·学记》上的两句话。杨老说，这话还可以加上一句“行然后知难”。他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：念书时，考试出了十道题，做对了八道，错了两道，得了八十分，成绩甲等，很好；可教书、工作就不能这样了。老师教书，讲对80%，错了20%，那就是一个蹩脚的老师；工作写一篇材料，对八条，错两条，那就要误大事。这五十年中，感受最深的一条就是“知不足”、“知困”、“知难”。特别是有书本知识的人，回到实际工作中去，那就会感到世界很大，自己很小，不谦虚也得谦虚起来。杨老的这些话，使我想起了《会计法》起草过程中的一些事情。

《会计法》从1980年开始起草到1985年正式颁布，前后历时四年多，在杨老的直接组织下，二十多次易稿，五次全国范围的大讨论，每次杨老都深思熟虑地提出不少问题。对会计，无疑杨老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但对法律，总是隔了一行。他“行然后知难”，当时他已年过花甲，但仍夜以继日，查阅世界各国会计

法，翻阅《六法全书》，学习法律的有关知识，向法律专家请教，不断地充实自己的法律知识。五年中，他研究了会计与法律的结合，根据起草《会计法》的实践体会，总结归纳了针对性、可行性、责任可衡量性、重要性、相对稳定性等五条原则，并对用法律规范的形式，表述会计的性质和任务、会计的职能和作用、会计管理体制等问题作了探讨。写出了十万余字的学术论文，为发展我国会计法制建设理论作出了贡献。

杨老的第二句话是：“业精于勤，行成于思”。这是唐朝韩愈《进学解》一文中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嬉；行成于思，毁于随”的前两句。就是说学业精深来于勤奋，工作成功在于认真思考。杨老说，仅仅感到不足还不行，还要一勤二思。既然觉得不足，就要锲而不舍努力增加知识，就要想尽办法创造做好工作的条件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：五十年代搞制度，有两个科目取名费尽了脑筋，就是“待摊费用”和“预提费用”。这两个名词西方有，苏联也有，那名词可长啦，叫什么“现在支付的为以后创造收益的费用”等，啰嗦极了。在安司长的领导下，几个人整整想了三天，终于用了“待摊费用”、“预提费用”这两个名词。现在看来，这两个名词非常中国化，而且含义确切，通俗易懂，至今大家都习惯。这虽然是件小事，但却体现了“业精于勤、行成于思”的精神。我想到这些年来，杨纪琬教授在改革成本核算中的一些思考。从1980年中国成本研究会成立开始，他就在琢磨如何改革单一的产品成本核算，直到1984年中国成本研究会第五次理论讨论会上，他才系统地提出“五种成本核算”的理论构思；1986年第六次理论讨论会上，他又进一步提出了“改革财务成本，发展管理成本”的具体设想，前后慎思达七年之久。会计改革也是如此，在一片改革浪潮声中，杨教授不人云亦云，1986年他提出了“六个必须”：必须把会计改革纳入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之中，必须针对现实经济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问题进行改革，必须实事求是尊重科学，必须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，必须是渐进地一步一步地进行，必须要为改革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。这些指导思想，对正确引导我国会计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写到这里，我不禁想起杨教授在所著《社会主义会计理论建设》的《自序》中的一段话：

“自审每有写作，大都是经过长时期的沉思默索而形成的自己的观点，往往为求此一得之见，历经数月的踟蹰，力求不囿于成见而有所创新，以期无愧于读者。”接触过杨教授的人，大都能感受到他那渊博的



关于固定资产增值后折旧 额的计算方法

张俊武

《财务与会计》1988年第8期刊登了阎凤翔同志关于《固定资产增值后折旧额的计算方法》一文（下称阎文）提出的计算方法仅仅是直线折旧法（或称使用年数法），而折旧额的计算实际上还存在着加速折旧法，而且这一方法，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，愈来愈表现出其重要性和科学性，因此，笔者试在此作一补充说明：

一、固定资产某项性能增加而增值，但使用寿命未延长

假设某固定资产原值为W元。使用Na年后新增价值为△W元，使用年限为N年，增值后第n年的年折旧额为X元（ $n+Na \leq N$ ）则：

1、按年数总和法计算：

$$X = (W + \Delta W) \cdot (1 - 0.1) \cdot \frac{N - (Na + n)}{\sum N}$$

2、按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：

$$X = W \cdot (1 - 0.1) \cdot \left(1 - \frac{2}{Na}\right)^{Na-1} \cdot \frac{2}{Na}$$

$$+ \Delta W(1 - 0.1) \cdot \left(1 - \frac{2}{N - Na}\right)^{n-1} \cdot \frac{2}{N - Na}$$

二、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延长而增值

仍按上面的假设，再假定使用Na年后新增价值为△W元，并且寿命延长为△N年（ $n+Na \leq N+\Delta N$ ， $n \leq \Delta N$ ）则：

1、按年数总和法计算：

$$X = (W + \Delta W) \cdot (1 - 0.1)$$

$$\cdot \frac{(N + \Delta N) - (Na + n)}{\sum (N + \Delta N)}$$

2、按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：

$$X = W(1 - 0.1) \cdot \left(1 - \frac{2}{Na}\right)^{Na-1} \cdot \frac{2}{Na}$$

$$+ \Delta W(1 - 0.1) \cdot \left(1 - \frac{2}{N + \Delta N - Na}\right)^{n-1} \cdot \frac{2}{N + \Delta N - Na}$$

知识和处事的才能，我想，这也许正是杨教授五十年来不断地一勤二思的结晶。

杨老的第三句话是：“自强不息”。这句话出自《周易·乾》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。杨老说，上面讲的是指主观的努力，但还有个客观环境的影响。“自强不息”可以理解为：第一、碰到困难、挫折，不泄气，不后退；第二、要独立思考，自有主张，不唯书，不唯上；第三、当你的工作或你的见解不为别人理解时，不埋怨别人，只要你认为正确的，就坚持；而当发现自己是错误的时候，就勇敢地承认并改正；第四、还要有改革、开拓、创新的精神。他举了五十年代“一边倒学苏联”的事例。当时，会计工作强调学习苏联模式，连科目名称也要用苏联的翻译名词。可惜我们当时缺乏“自强不息”的精神，致使工作走了不少弯路。

杨纪琬教授最后谈到：五十年，我就是积累了这三条体会。虽然我自己还不能做到念兹在兹，但我确

信，任何人只要能做到这三条，搞学问、做工作，都必然会有成就的。“实至名归”是一个真理。有了“实”，自然会有成就，也自然会有“名”；如果没有“实”，而去追求“名”，即使暂时得到，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，最终也会戳穿“西洋镜”的。

专访结束了，我接受了杨纪琬教授的建议，没有开列“帐单”。对于象杨纪琬教授这样蜚声中外的会计专家，要开列出他的成就的“帐单”，也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。这里，只是把总结他五十多年会计生涯的三句成语奉献给读者。我们从中看到的，不仅是老一辈专家走过的路，而应该是有更多的后人，沿着他们开辟的路继续不断走下去。

就广大青年财会人员来说，我也想借用《论语》中的一句话来结束这篇专访记：对于杨纪琬教授以及所有老一辈专家给我们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，应该是“学如不及，犹恐失之”，应该要有十分迫切的心情。在老一辈专家们的传授下，让一代新人更快地成长起来。